

壹、前言

1724年，一名普魯士男嬰誕生於哥尼斯堡（Königsberg），此後終其一生即未曾離開過故鄉。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，而畢生深居簡出、未曾跨越故土邊界者大有人在，特別的是，該普魯士人卻能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，出版過《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》（*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*），還在大學講授「自然地理學」（*Physische Geographie*），並在西方啟蒙運動成為執纛者（Kuehn, 2001, pp. xv-xxii）。

前述這位學識淵博、思慮精深的文化巨人，正是後來被譽為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I. Kant（1724-1804）。德國的Kant哲學專家Schnädelbach（2005, p. 835）甚至認為哲學史應以Kant做為分界線：

所有的Kant反對者，我們亦應嚴肅以對；說穿了，他們亦為Kant主義者（Kantianer）。因為Kant總是以一種難以想像的迂迴方式，迫使人們去研究他，至今無人能迂迴繞開；任何想要開創一種Kant哲學類型以外的哲學，還先得對其留下的烙印批判一番……Kant在哲學史居於無人可比的獨特地位，因此應將哲學史劃分為「前Kant」／「後Kant」階段。

或許並非人人都如Schnädelbach將Kant哲學冠以如此崇聖的地位，但對哲學史稍有涉獵者，大概都難以否認其重要性；就連並不欣賞Kant哲學的分析哲學大師Russell（1967, p. 704），亦肯定其在西方哲學史上具有「非常重要」的地位。

Kant雖終生未出遠門，但其學說與時俱進，參照了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，強調經驗與理性的結合，不僅批判傳統理性主義摒棄經驗之舊式形上學，並駁斥經驗主義對於必然真理之否定。對於這樣一位哲學界巨人，或許我們會對其學述歷程感到好奇，但正如前述，他終生未曾離開過故園，僅在其故鄉的哥尼斯堡大學（Universität Königsberg）「就近入學」（Kuehn, 2001, pp. 61-99）。

Kant能「就近入學」，與其說是其怯於遠離家園，毋寧說是因為德國大學體制之「均質性」（Homogenität）特色，而使其能免於舟車奔波、負笈他鄉

求學。這種大學「均質性」傳統亦為型塑近代德國大學風貌的F. W. C. C. F. v. Humboldt（1767-1835）奉為圭臬，以致近代德國高等教育體制主要建基於均質性原則（Spiewak, 2006）。誠然，Humboldt做為近代德國大學發展之掌舵者，其對於大學體制的影響範圍與幅度不容小覷，除了前述之均質面向外，其對於學術自由與人文精神面向的影響亦十分深遠，但本文僅先侷限於均質性面向的影響，而不涉及其他面向之論述。

但近年來，德國高等教育政策開始啟動多項的競爭分化機制，其邏輯為「誰有就給誰」（wer hat, dem wird gegeben）（Hartmann, 2007）；也就是「扶強不扶弱」，強者增益其強，弱者若不迎頭趕上，將會陷入愈來愈艱困的處境，這就是所謂的「馬太效應」（Matthew effect）。那麼前述的各項競爭分化機制，將對傳統德國大學的均質特色帶來多大影響呢？針對此議題，本論文以「洪堡與馬太之對決」的隱喻為題，並透過文件分析法，首先探究德國大學之均質性傳統，以及近年來之競爭分化機制，而後再進一步探究後者對於前者之影響程度。

貳、德國大學之均質性傳統

為闡明德國大學之均質性傳統，以下先說明其所獨具之均質性現象，而後再從各種不同向度探究其均質性緣由。

一、德國大學之均質性現象

Clark（1983）為闡釋各種力量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，提出了分析和比較各國高等教育系統的「三角協調」（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）之經典模型，即影響高等教育系統發展的三重力量，包含國家權威（state authority）、學術權威（academic oligarchy）與市場（market），如圖1。

由圖1可以看出，美國大學被視為市場力量主導的代表；奉行社會主義的蘇聯則以國家權力為主導；而義大利則以學術權威為主要支配力量；其他歐陸國家的高等教育體制介於國家權力與學術權威間；至於市場所扮演的角色則相對闕如。

德國大學從中世紀創建之初，即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，其擁有部分之規章制定權以及審判權（Rashdall, 1936）；與此同時，大學也隸屬於封建領主